

历史春秋

# 司马光砸的不是缸



司马光画像

如果司马光泉下有知,看到一千年前他所为大宋做的一切都已被人淡忘,使他名扬百世的竟然是一口缸,恐怕连他自己都会哑然失笑。这位享寿66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将一生的抱负写进了那部史学巨作《资治通鉴》中,却没想到历史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不过,置身政坛,千古功过任人评说,多少人来了又走,所谓功名也只不过为王侯家锦上添花而已;但是砸缸救友的英雄少年,遍翻青史恐怕也只有司马光一个。砸缸,这一英勇的行为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激励着孩子们的成长,为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责任和担当。

## 砸缸的真相

1019年,河南信阳光山县令司马池喜得一子,由于自己时任光山县令,司马池就为其取名曰“光”。司马一门,原是魏晋时期“司马八达”之一司马孚的后人,世居山西涑水,却因阴阳错地因为河南光山扬名。不过,司马光并没有忘记他的故乡,逢人总会谈起山西涑水,世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而因着涑水先生,一众人志同道合,为往圣继绝学,又形成了一个“涑水学派”,司马一族的文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说起少年司马光,“砸缸”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经常有好事者质疑司马光不可可能砸缸、砸不砸得动缸、砸的是不是缸,甚至还有人为此进行了严肃的考证:有文物专家认为,宋代造缸技术还不成熟,司马光是可能接触到缸的;有考古专家却发现没有宋代缸的残片,认为司马光砸缸完全是有可能的。

不过究其本源,司马光砸的可能真的不是缸,而是瓮。

宋代有个诗僧,法名为惠洪,他曾经写过一本名叫《冷斋夜话》的诗论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书中,惠洪不但点评诗作,还多收录诗人轶事。在写到司马光的时候,惠洪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光童稚时,与群儿戏,一儿偶堕瓮水中,群儿奔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髫髻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而《宋史》上则记载得更为精炼:“群儿戏与瓮,一儿登瓮,足跌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可见,司马光“砸瓮”这个故事应该是确有其事,而司马光的机智也在当时就成了家长们教育孩子的绝佳范例,家长们将印有司马光砸瓮的图画买回家,司马光成了“别人的孩子”,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羡慕和效仿。至于“瓮”怎么变成“缸”的,这可能就完全是因为读起来顺口,谁让他的名字叫司马光呢?司马光砸缸显然要比司马光砸瓮要好听很多。

其实,司马光砸的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勇敢和机智。砸缸这一事件对于少年司马光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了,后来文质彬彬的治国能臣在少年时代充文充武,十二岁那年,司马光随着家人由河南前往四川广元,都说蜀道难,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这一次,还真让司马光遇到长蛇了。全家人手足无措之时,司马光抽出利刃,扎在蛇身上,将蛇打落悬崖之下。秦汉时有五丁斩蛇开山的故事,而司马光作为一名十

多岁的少年,以一己之力搏斗长蛇,恐怕要比那开山的五丁还要英勇呢。

## 天地大文《资治通鉴》

说起二十四史,恐怕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它厚重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而在这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部史书是历代王侯将相治国理政所必备的,这就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与二十四史以“书”“史”命名不同,《资治通鉴》这个名字意味更加深远,这四个字是由宋神宗亲自敲定的,取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说,宋神宗当初安排司马光主持编纂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铸造一面镜子,从中体悟治国理政的道理。显然,司马光的工作是卓越的,一部《资治通鉴》,成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之作,后人盛誉其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并认为无论是君臣,都应该熟读这部著作:“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梁启超对其评价更是可以被称作是空前绝后:“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毛主席对这部书也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竟达十余遍之多。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北征,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可谓浩浩荡荡,卷帙繁多,为了编撰这部著作,司马光是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时间。《资治通鉴》与以纪传体为主的二十四史不同,它的体例主要是编年。它不再是就事说事、就人说的讲故事,而是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后不但了解了历史事件是怎么回事,更弄明白了它的起因、经过、结果乃至余波。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夹叙夹议,将自己有关政治的见解写在了对历史的梳理中,司马光执政讲究儒家的“礼”,也就是名分,他敏锐地察觉到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对于周礼的破坏性,便将其定为这部书的开端;而周世宗北征征的是契丹,收复雄州则意味着礼的恢复,故而,司马光将其作为著作的结束。司马光一生追求“礼”,并将“礼”看作是大宋江山的基础,这部书其实正是司马光一生政治见解的集中体现。

## 与苏轼、王安石的友谊

古人讲究“生前身后名”,对那些从小浸染在文山墨海中的政治人物们来说更是如此,而司马光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其成就和待遇都令千古文人羡慕不已。

司马光幼时既有“神童”美誉,未满二十岁即考取进士,从此一路平步青云,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直做到尚书左仆射、龙图阁直学士。去世后,朝廷鉴于其编撰《资治通鉴》,追赠其太师、温国公,并许其从祀于孔庙,康熙年间,又许其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这对于传统文人来说,是极为尊贵的荣耀了。不仅如此,对司马光,朝廷赐其谥号曰“文正”,从谥法来讲,“文”乃是“经天纬地,刚柔相济”,“正”乃是“内外宾服”,皆是极上品的称号,这不仅是对司马光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人格的赞美。

大宋到了神宗一朝,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司马光自不用说,苏轼、王安石等人也都是万古扬名的名臣或者大文学家,这些人聚在一起却未必那么团结。起初,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三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毕竟置身官场,又都是有极强政治抱负的不世之才,都说一山难容二虎,三人同朝更是免不了争执,于是,同是出于对赵氏天下的责任感,三位好友一时间竟成了水火不容之势,乃至分道扬镳。司马光守旧、王安石革新,苏东坡徘徊在新旧之间,于是,三人总是在误会之间分分合合,离多聚少。

1086年夏天,当司马光得知曾经的好友、曾经的政敌、曾经将其从政治舞台上逼走十多年的王安石病逝,他回想了自己的过去,惆怅不已。此时,王安石的新政已被重新登上政坛的司马光亲手废除,世人皆以为司马光会对王安石的一生进行苛刻的评点之时,他却说“不可毁之太过”,的确,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政治见解的不同都是为了国家的昌盛、百姓的安康,这就是君子之交,惟德是论、无偏无党,就凭着这六个字,司马光就配得上“文正”的谥号,也称得上是千古名臣。

王安石去世不久,司马光也离开了人间,也许在那边的世界,这两位旧时好友还能把酒言欢,言笑晏晏。

## 古代官员也要报告个人事项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制度,其中有许多对官员的管理制度,包含了要求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古代任官实行避亲制度,规定有嫡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关系者,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职,或不能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央高级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都及附近任府县官,职卑者要回避,改任他官,以避免和防止官场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发生。

宋代为避免违规和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规定在官员被任命时,个人都要填一份称之为“射阙状”的表格,详细说明自己在所任衙门上下级关系,或与本衙门行政业务联系密切的机构中有无回避的亲属,保证“如后异同,甘俟朝典”。此外还要有两名官员作保,为其写出书面的“保官状”证明。倘若官员“射阙状”故意隐瞒真情,一经查实,要受杖一百,予以惩罚;“保官状”材料失实,作保官员也要受法规处分。

古代实行丁忧之制,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尊长之丧,须暂离职而在家居丧守制。清代规定,官员家中有此类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官员匿丧不报的,革职处理,不准援赦。呈报丁忧迟延者,罚俸一年;漏报紧急字样者(如继母、嫡母、生母、慈母之类,是否嫡长孙之类,古代亲属称谓十分复杂,生母未必是嫡母,而慈母则用于这种情况,即妾所生之子丧母,其父令别妾抚育,则此妾为此子之慈母),罚俸六个月。官员也不能为了规避苛刻、远避等目的捏报丁忧,违者革职。闻丧不报,擅自离任者,降二级调用。

古代对官员实行考课制度,依据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唐代规定,“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位九等考第”。宋代规定,受考核的京朝官(京官和升朝官的合称,宋代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文武官员总称升朝官,通直郎、修武郎都为正八品官)将本人考课期间的言行为政,进行回顾与检讨,如犯有错误必须悉记,不得规避漏写。负责考核的官员进行核对,如发现漏写,受考核的官员要受相应处分。

古代的请假制度规定,官员不能正常上下班或因公离境须请假报批。元代规定官员有病有事不能上班,均需请假。请假的报告称为“曹状”。如果未上班又不报“曹状”,就要罚俸或给予行政处分。清代规定官员必须居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各省官员因公离境必须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若谎报公出离境,会受相应之处分。官员必须正常朝参(京官)或公座(外官),不得迟值或早散。官员若有应早散值情况,应将具体情况及缘由告知管门太监,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官员无故散值过早者,罚俸六个月。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官员的管理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制度,且规定的内容较为具体详细,对执行的情况要进行考核检查,对不遵守规定的还要给予相应处罚,这对我们今天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有借鉴之处。(《中国纪检监察报》)

国学林一叶

## 趣读《道德经》

读书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当然是开心快乐啊!如果每次读书都要正襟危坐,不停地告诉自己学习了,这样心理上会有压力,不如轻松阅读。就拿读《道德经》来说吧,还有个名字《老子》,光这就吓倒了一批人,看看书名就觉得读不下去了,“道德”还“经”,更别说翻开之后那些“天啊,道啊”,完全不知作者所云。

让我们怀着八卦的心态去读读,说不定能看下去呢。这本书完全不像《论语》记录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琐事,这是老子的内心独白,是他写给当时那个世界的情书,充满了他的爱与恨。

当时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多有战乱。“春秋无义战”,各个小国家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因此老子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亦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是他长久观察战争得出的结论。刍狗,祭祀用的干草插出来的墓葬品,形状像狗一样。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后来信仰道教的人都忙着“修道成仙,想要长生不死”,有炼丹的、有进山修炼的。而聪明如老子,他很早就知道“死而不亡者寿”,死去的人不被遗忘才成为真正的“长寿”。

看过一部墨西哥关于亡灵节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那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如果彻底被人遗忘,那就是真正的死亡”。和老子的说法相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面对缤纷五彩的外界,老子似乎看得透彻,他告诉我们不要被欲望所牵制。就像圣人那样,只关注民众的温饱,摒弃耳目的奢望,保持生活的稳定。就像我们今天追求的诗和远方,里面含有一样的淡泊与宁静。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阐述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在《道德经》中,他提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胜刚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拿人和草木的生死,来举了个例子,说明柔弱可以胜刚强。虽然有时不全是这样,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世上的众人都兴高采烈像要去参加大宴会,又如春日登台心旷神怡纷纷,而我却独自漂泊,不知向何处去。这是他一个人的孤独寂寞冷。

走到人生尽头,一个叫老子的智者决定去死,临死之前,他把生前的感悟,凝结成书,想留给懂他的人,他微笑着告诉后来的智者,面对世上的一些事情“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江寒汀的《岁供图》



《岁供图》(《岁供图》)始于唐代,起先不过是一些仕绅、文人在大年初一将金石、书画、古董等雅玩之物精心摆设在临窗的案几上,渐渐地也将这些物品勾染成画挂壁,意在祈福纳祥。江寒汀(1903年—1963年),近现代画家。传世作品有《百卉册》《百兽图》等。

## 话说府城“装马匹”

等海南历史人物,也有铁拐李、汉钟离等八仙以及七仙女等传说中的神仙人物。

丘濬、海瑞都是府城金花村人,被称作“海南双壁”,之所以纪念他们,意在鼓励后人继承丘濬风范,发扬海瑞精神。

“装马匹”队伍,浩浩荡荡,服装新颖,人物众多,威严毅勇,恬淡宁,一城春色半城景。每当队伍从府城主要街道一路巡游,与沿街群众共同欢度元宵佳节,观赏“装马匹”巡游的群众山人海,热闹非凡。

琼山具有上千年历史。唐虞三代,海南岛属于“百越之地”,被称为“南服荒徼”。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珠崖郡治所就位于现在的琼山区。在唐代元宵,就有古诗记载关于灯火盛况与游乐场景,“装马匹”的雏形始于此。古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宋朝以后,府城是全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海南卫城池”内,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宋代词人辛弃疾在《青玉

案·元夕》中生动地描绘了元宵之夜的盛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装马匹”发展到宋代,被称之为“宝马”,其豪华程度可见一斑。据考证,每当元宵节来临的时候,在府城地区,一些上年纪的当地人会化装成古代戏剧中人物骑马巡游,拜年,祈福求平安,一是寓意驱邪扬善,祷告先人保佑;二是显示本地地区的富足,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如今这个传统习俗延续下来,只是曾经的“马匹”被“三轮车”取而代之。

往事越千年。为纪念琼山先贤海瑞而命名的忠告路,是府城古今商业集市,人流集中,居民点密布的主道,也成为“装马匹”的主要巡游线路之一。如今,在琼山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装马匹”民间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地著名的传统民俗节目之一和琼山区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每年吸引中外游客数万人次前来观光旅游,“装马匹”蜚声海内外。

##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